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 南宋浙江词人 群体研究

吴冬红 著

東風外，
颺暖絲晴絮，
如織。燕約鶯期，
惜如。香船半
湖春色。盡入西
冷。

柳陌新烟凝碧。
映簾底宮眉，
怕梨雲夢
輕暝。籠寒
杏香愁冪。
奈蝶怨、
怎生去得。
良宵岑寂，
寒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
南宋浙江词人
群体研究

吴冬红 著

中國社會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研究 / 吴冬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348 - 4

I. ①地… II. ①吴…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浙江—南宋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992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4NDJC050YB)

序

“东湖的荷花颇有声名，每当荷花盛开之季，曾惇与名流雅士宴饮于东湖之亭，兴之所至，折荷叶以为杯，醉饮于十里荷花之中。洪适词《好事近·东湖席上次曾守韵，时幕曹同集》描写了东湖宴集赏荷之情景，词云：‘风细晚轩凉，妙句初挥新墨。绿水池中宾佐，对嫩荷擎绿。坐看微月上云头，清臂映寒玉。只恐朝来酒醒，有文书羁束。’洪适此词为‘次韵’之作，则曾惇在东湖赏荷席上已先行作词。绿水池中对嫩荷擎绿，挥新墨书妙句，词人甚至不愿醒来重遭文书羁束，文人之雅趣展露无遗。”当我摆脱杂务，从连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中回归无人打扰的慵懒，静静地兀坐窗前，望着不远处杨树的枝叶在清风中婆娑，听着马路上车子经过时发出的阵阵噪音，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心驰神往，如醉如痴了。眼下的季节，还不到荷花盛开，几天前在湖北黄冈游东坡赤壁时所见，也只是很小很小如新生儿刚生出的模样，贴着水面，不肯把稚弱的头昂起，但我还是禁不住想象台州东湖那十里嫩荷擎绿、清臂映玉的情景，体味、领会曾惇与一帮文士，折荷叶为杯盏，酣饮醉卧于一望无际的红绿之中的畅快与适意、淋漓与恣意。同时，脑海中再次浮出大大的问号：词学何为？词人何为？

遥想南宋当年，两浙地区有多少词人享受着东湖荷花式的天馈自然美景，咀嚼着湖光山色无尽的润泽，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作于斯；有多少词人怀抱致君尧舜收复失地的政治梦想，浮沉于宦海无情的碧波和风涛，他们仕于斯迁于斯谪于斯，作于斯；又有多少词人仰慕上国的绮树蕙枝流风繁华，渴望一睹西湖西子的淡抹浓妆，他们游于斯耽于斯老于斯，作于斯。这些词人，浙产的，与寓浙的，其数量十分可观；其

中,同时进行唱和或者其他词学活动者,就构成浙江词人群体,他们有以曾惇、洪适、曹勋、钱端礼、朱敦儒、王之望等人为中心的台州词人群体,由叶梦得、葛胜仲、沈与求、刘焘、许亢宗、富直柔、莫彦平、刘一止等人组成的湖州词人群体,张鎰、姜夔、楼钥、洪迈、杨缵、周密、张枢、张炎、陈允平、施岳、徐宇、奚臧、李彭老等人形成的杭州词人群体,史浩、汪大猷、楼钥、吴潜、刘长翁、翁元龙、刘自昭、胡景回、梅应发、李直翁、叶士则、惠计院等人的四明词人群体,由辛弃疾、张鎰、李浹、姜夔、丘密、赵蕃、王英孙、王易简、唐艺孙、陈恕可、王沂孙、周密、唐钰、吕同老等形成的绍兴词人群体。这是一支庞大的词人队伍,人数超过百人,有的词人参与跨地区的唱和活动;这是一支强大的词人队伍,举凡南宋大词人、知名词人,基本上都在其中。浙江词人群体的创作,形成宋代词史上非常重要的景观。尽管群体中的有些词人,其作品流传甚少,孤立地看,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根本没有词作流传下来,现在的我们不经意间不会把他们当作词人看待,但通过吴冬红女士的勾勒、还原,他们当年参与唱和,共同创建了浙江乃至南宋词坛的繁荣,是可以肯定的。

文学群体的研究,离不开这样八大要素:群体的领袖或者组织者是谁;群体的规模如何成员有哪些;群体形成的时间、存在的时间、活动的时间和频次;群体活动的空间范围和具体场所;群体活动的形式、主题和结果;群体的性质、特点如何;群体的文学宗旨或者其他诉求是什么;群体的成就、价值或意义如何。一个群体的领袖、组织者,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同时或异时地有两个或更多。一个群体的规模或大或小,但成员是构成群体的基础,必须知道有哪些人或者多少人。有的群体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有的群体则是长时间的,其活动有规定的频次或节奏,其形成、解散都有准确或者大致的时间可考。群体的文学活动,都有一个空间范围,有的固定于某个场所,有的按照一定的次序变换,留下集体活动的历史痕迹;有的则随着领袖人物空间的移动而移动,甚至隔空唱和,形成群体。空间是考察群体的重要因素。群体的文学活动,往往赋得征题、拈韵分字,留下若干同题、唱和之作,或者结集成书。群体可以是家族的,地域乡邦的,同仁、同年的,性别的,也可以是某个流派的,学派的,政治团体的,同一行辈或者某一年龄段的,所以,他们

有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审美追求，或者政治诉求、生活理想。群体的成就、价值有大有小，有的群体只是备员而已，有的群体则推动、影响、规范了一个空间范围内、某一时时间段的文学创作。这八大要素，一个群体全部具备，其面貌将是生动的、清晰的；具备三个，是构成群体的最低起点；达到五个，则其基本轮廓呈现出来了。文学群体与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有交集，又有不同，群体的松散性、集团性，显然超过流派、社团。

吴冬红女士的这部著作，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南宋时期浙江词人群体的历史面貌。在这里，我们看到宋室南渡时期台州词人群体，在曾惇的引领下多次唱和活动，他们生当乱世僻壤，却有意疏离于政治，追求风雅，却又回应着时代词学的发展步伐。我们看到以叶梦得、葛胜仲为中心的湖州词人群体，追慕唐代张志和，以及北宋张先、苏轼等人的流风余韵，向往浮家泛宅、高蹈隐逸的生活，又不忘家国变迁之忧。而都城词人群体，又有以张镒为中心的一派，在私家园林里弦歌；以杨缵为中心的一派，在西子湖畔从事声律之辨；以周密为中心的临安遗民词人群体，则用词集体书写着西湖的影像，抒发着他们山河异变的恋旧情怀。在这里，词人群体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因而有着鲜明而充分的群体的个性特征，如绍兴词人群体，典型地兼具时代、地域之特点，“辛弃疾是坚决的主战派，一直为收复失地奔走呼号，在退隐九年之后被重新起用，绍兴自古以来形成的尚勇强悍、刚硬不屈的民风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迹与辛弃疾被压抑的情感相碰撞，在绍兴的地域平台上，辛弃疾敏锐地感受到越地文化的特色，他以词作为陶写之具，在怅望越中山川、缅怀历史遗迹时，以《汉宫春》为词牌，一口气写下了四首词，另有一首《上西平·会稽秋风亭观雪》。同时辛弃疾的到来，也掀起了绍兴词坛的唱和高潮，为浙东文坛带来了一股昂扬向上之气”。绍兴词人群体，与重学崇礼、尚老敦伦的四明词人群体绝然不同，无论是以史浩为中心的退休官员的群体唱和，还是以吴潜为中心的地方官员的词学雅集，四明词人群体在词作内容、情调、语言、审美上，都是“四明地区尚礼之风熏染之下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体现”。

在对浙江台州、湖州、京城、四明、绍兴五大区域的词人群体进行脉络梳理、内部特征辨析之后，吴冬红女士还从整体上概括出浙江词人

群体的总体风貌，那就是“余论”中关于南宋浙江词人群体创作的“浙江文化元素”、浙江清雅词风的地域传承两部分的探讨，这个探讨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深化，但对我们认识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的时代的、地域的、文化的群体特征，还是颇为有益的。

大约十年前，吴冬红从浙江来沪攻读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写的是曹勋词的研究。毕业几年后，她所在学校对教师提出专业提升的要求，就回到母校做访问学者，这个题目就是访学时的课题，当然，此前她已有若干想法。记得课间、课后，她常与我讨论，更多的时间则是泡图书馆，全身心投入读书和写作，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校方对访问学者的管理其实是很宽松的，甚至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冠以学校的名义发表论文。访学只有一年，她很勤奋地写出了书稿中的大部分内容。访学结束后回到原单位，她又多次与我沟通，谈她的想法，她的困惑。词学界关于浙江词人群体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吴冬红在完成本课题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借鉴它们，这些成果成为她的参考，更成为她的“焦虑”，求新是她进行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研究的出发点、支撑点，新意也是她这部书稿的整体特点。全部创新谈何容易，局部新，已然不易；始终葆有创新意识，才是重要的。

是为序。

彭国忠

丁酉年农历四月初四 沪上

目 录

绪论	(1)
一 南宋浙江词人之盛与区域文化的多元性	(1)
二 地域文化视阈下的宋词研究	(6)
三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12)
第一章 宋南渡台州词人群体研究	(15)
第一节 宋室南渡与台州文学生态的新变	(15)
第二节 乱世僻壤中的词学雅集	(22)
第三节 台州词人群体的聚合与政治的疏离	(29)
第四节 雅的追求与时代呼应	(40)
第二章 宋南渡湖州词人群体研究	(47)
第一节 清远之地与文人酬唱的历史传统	(48)
第二节 宋南渡湖州词人群体的交际网络	(56)
第三节 “浮家泛宅”的隐逸文化效应	(60)
第三章 南宋都城词人群体研究	(80)
第一节 杭州:诗意的都市范型	(80)
第二节 私家园林的都城弦歌:以张镃为中心的 词人群体活动	(92)
第三节 西子湖畔的声律之辨:以杨缵为中心的 词人群体活动	(121)

第四节	山河异变的恋旧情怀:临安遗民词人对 西湖影像的集体书写	(157)
第四章	南宋四明词人群体研究	(175)
第一节	南宋四明的重学崇礼之风	(176)
第二节	闲居官员的乡友之睦:以史浩为中心的词学活动	(181)
第三节	地方文官的社交酬唱:以吴潜为中心的 词人群体活动	(187)
第五章	南宋绍兴词人群体研究	(211)
第一节	越地文化特质与文人结社联吟之风	(212)
第二节	越地历史文化的情感触发:以辛弃疾为中心的 词人群体活动	(219)
第三节	山房书院中的兴寄咏物:越中遗民词人的 结社联吟活动	(230)
余论		(255)
第一节	南宋浙江词人群体创作的“浙江文化元素”	(255)
第二节	浙江清雅词风的地域传承	(258)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71)

绪 论

一 南宋浙江词人之盛与区域文化的多元性

浙江在两宋时期是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区域，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①北宋时浙江的经济就很发达，苏轼曾言：“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②南宋定都临安，政治中心的确立，更促进了浙江经济、文化的繁荣，本地人才纷纷崛起，“浙为词薮”，宋代浙江盛产词人，朱彝尊曾指出宋代浙江词人之盛的实况：“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③众多浙籍词人中除了周邦彦、张先等少数词人为北宋时期，余皆属南宋词人。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录有明确占籍的词人838人，浙籍词人有216人，占词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一书中，对宋词作者队伍的地域分布进行了定量分析，梳理出来的浙籍词人有200人，其中北宋词人48人，南宋词人107人，时代不详45人，^④数量均位列于各省份之首。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②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二《进单镔吴中水利书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〇《孟彦林词序》，《四部丛刊》本。

④ 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宋室南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两浙成为大批北方移民寓居的首选之地，所谓“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①。“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②流入两浙之西北人显然多于其他诸路，据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统计，迁入临安府的北方士人数量最多，迁入台州、越州、明州、湖州的人数也居于前列。^③“在南宋之前，中国人物多集中于黄河流域；南宋以后，则渐转移于扬子江流域，而荟萃于江浙。”^④南迁至浙江的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使南宋浙江版图上文人的密度大幅度增加，这些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词人，他们在浙江的大量聚集，形成了“南宋词人，浙东西特盛”的词坛格局。^⑤都城临安凭借地域优势，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词人雅集空间，浙江其他城市也以独特的地方声音，形成在地的文化，吸引着众多词人云集。大批外来词人与浙江本地词人一起构成了庞大的词人群体，朱彝尊《鱼计庄词序》云：“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耳矣。”^⑥将寓居在浙江的外援词人也归为浙派词人。梅新林先生曾论及文人的流动现象对文学格局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版图而言，流域轴线是其‘动脉’，城市轴心是其‘心脏’，文人群体则是其‘灵魂’，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古代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⑦浙江成为南宋词学活动中心，大批流寓者为浙江词坛增盛，同时外来词人也深受浙江文化的濡染，浙江的地域文化场重新陶冶着他们的气质，进而影响到词学创作。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51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5页。

③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④ 朱君毅：《中国历代文人之地理分布》，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页。

⑤ 石岩：《志雅堂杂钞·序》，周密《志雅堂杂钞》，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⑥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〇《鱼计庄词序》，《四部丛刊》本。

⑦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9页。

从宋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来看，彼此之间的交游酬唱明显增多。宋代文人是集政治、文学、经术于一身的政治主体，往往兼有官僚、文学家、学者三位一体的社会角色，这会强化彼此之间的政治、文学互动，从而也促成文人结社雅集、交游唱和之风兴盛。王水照先生在比较唐宋文人的生存方式时指出：“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① 有学者也曾指出：“文人集会广泛涉及时代风会、文人交往、心理表现、传播接受等多个层面，它既是精英生活的集合，也是沟通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编织人际网络、进行文学创作、游戏娱乐、交流情感的场合，因而具有较大的文化包容量；而这样的集会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其最兴盛的时期却是在宋代。”^② 宋代文人群体意识趋强，集会、结社之风兴盛。

宋室南渡后，在浙江这一地域范围内云集了如此高密度的词人，加之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外来词人与本地词人之间的交游酬唱频繁，大批带有明显浙江地域文化印记的词人群体涌现出来。

中国自然环境，南北差异明显，所谓“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孕育出迥然不同的南北文化，学术史上的区域视角，主要集中在对南北二元文化的区分和讨论上。浙江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具有江南一般的区域文化特色，但浙江各区域的文化传统又非整齐划一，每一个小的区域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民情、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个性。如浙东和浙西的区域文化存在明显的不同，浙东多山地，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等；浙西多泽国，包括杭、嘉、湖等。《浙江通志》云“两浙水土风气不齐，故民俗淳漓不一”，“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从地理角度指出两浙处于不同

①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② 尚永亮：《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环境的地区，因所从事的经济生活不同，具有不同的文化性格：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嗇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间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①

王士性以地理要素为指标，将浙江地区划分为风俗各不相同的泽国文化区、山谷文化区、海滨文化区，但即便是属于王士性所言的同一文化区中，不同的区域也会因为历史积淀、民俗风情等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

区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浙江境内的文风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区域性特色。大的方面而言，表现在浙东、浙西两地文风的差异，对此问题学者们多有论述，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探讨有关文化地理问题时曾说过：“文化愈盛之省份，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② 浙西、浙东这种民风文气的不同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显性呈现。浙西水网密布，浙东群山环抱，不同的质地衍生出不同的文风，浙西文风偏于柔婉华靡，浙东文风倾向于朴质无华。这种东西文化圈的差异在南宋浙江文人群体的活动中即有清晰的展现，浙西文人更儒雅，结社多悠游岁月、吟风咏月、享受承平世界的繁华富丽，创作的作品更注重文学的本色，多呈现辞藻华丽、风格柔婉、情思细腻的特点；浙东文人结社则更多关注现实，更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68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9页。

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文风刚武、厚重。杭州、越州词人群体分别为浙西、浙东词风的典型代表。如以杭州为活动舞台的西湖吟社词人群体沉醉于自然湖山、富宅贵邸，酣玩岁月，疏离现实，注重词艺的研讨，词风清雅；以越州为活动背景的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以结社的方式表达历史沧桑之变，抒发亡国的愤慨，词风多苍凉和悲慨。造成这种词风的转变既有时代的因素，更有创作地域背景的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有时地域文化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政治因素。

从地域的因素将浙江以浙西、浙东来区分，这是一种为大家所认同的合理的分法，但若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则同属浙西的杭州、湖州，或同属浙东的明州、台州、越州，其区域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异，如杭州的奢靡尚雅之风、湖州的隐逸之风、明州的崇学重礼、台州的崇佛尚道、越州的重大义讲气节等，活动于其中的文人群体必然会在地域文化的背景上获得地域生命基因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浙江区域文学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大批士大夫集中活动于一些著名的城市空间之中，在这样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中的生活，必然会使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共同受到来自历史已经建构起来的，有关这样一座城市的经典文化意象的强烈影响。不仅如此，他们会在这种影响氛围下，努力去模仿和强化历史已经建构起来的这座城市的文化意象”^①。如活动于同一时期的西湖吟社词人群体和明州词人群体，一者极力强化词的艺术性，使之高悬为精英阶层孤芳自赏的精致文艺；一者则极力开发词的实用功能，使之成为传播乡俗礼仪的文字工具。而对于南宋浙江各个小区域词学个性多元并存格局的研究恰恰是目前学术界所忽略的一个选题。

地域文化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与政治风气、词坛风尚共同作用于词人群体活动。浙江是南宋词人群体活动与创作的最重要舞台，南宋浙江各区域的词人群体活动有着怎样不同的风貌？浙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在词人群体唱和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浙江地域文化因素对南宋词坛的走向以及元明清词坛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的词

^① 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学活动是如何参与浙江地域文化建构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深思的。

二 地域文化视阈下的宋词研究

文学创作的地域差异，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古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的心理、性格、气质以及民风民俗、审美风尚的濡养作用，《荀子·儒效》篇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之言，即指出所处的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行为习惯的影响。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其所处的环境也必然会对其创作产生影响。从史书中的地理志、地方志中由自然地理及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论说，到文学批评中的相关论著，探讨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由来已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①指出山水风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屈原的文学成就即得于楚国江山景物之助。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则注意到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影响到六朝南北文学风格：“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②将南朝、北朝文学传统的差异归结为“轻绮”和“气质”的对立，这是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而使文学呈现不同的特质。

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古人早就认识到，但是以地域作为文学研究的视角，则是近代的事情。1905年，刘师培先生发表了《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南北文学不同论”一章，从声音、水土等角度论述了南北文学的不同点，论及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刘先生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② 魏征：《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刘先生也指出南北文学互相渗透的特征。之前对“地域文化—文学”之关系的探究都是只言片语式的论述，刘师培的这篇文章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进入理性研究阶段，稍后汪辟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探讨过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如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指出：“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成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尤焉。”^②并将清末之诗按地域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

1990年，袁行霈先生根据他在日本讲学的讲稿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一书，其第三章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袁先生指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③在该书中，袁先生认为地域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过程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其二，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④他还指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东西的差异不如南北差异那么明显。政治中心、交通枢纽、经济繁荣地区易成为文学中心，袁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以后的地域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代文人的地域文化意识较前代有所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宋代方志的大量出现，其数量远超前代，亦引领后来者，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见于著录的宋代方志600多种，数量上远胜唐代。诸多的宋代方志除记载地理民情之外，还特别关注各地的文化。二是宋人习惯于以地域来划分学派和文学流派，如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关学、闽学、永嘉学派，文学中的江西诗派、永嘉四灵等。三是宋人对编选地域性文学总集、选集充满热情，如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朱熹编的《南岳

①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② 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③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④ 同上书，第33页。